

川嶋将生室町文化论考

张建立*

内容提要：战后 80 年来，日本民族文化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一直受到各界学者的关注。有些学者甚至将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追溯到极为久远的神话传说时代，认为其本自具足，是不断吸取外来文化要素成长起来的，但更多的学者则主张室町时代的文化才是现代日本民族文化的原点。既有研究多侧重从文化形态视角来探讨室町时代文化的特色，川嶋将生的《室町文化论考：文化史中的公武》等相关研究成果则更注重从文化形成论视角，从文化创造与传承的主体层面，深入解析长期受日本社会歧视的贱民阶层在室町文化的创造与传承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对我们探讨当代日本社会人权问题的历史渊源等尤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川嶋将生 日本文化起源论 室町文化 贱民 人权

二战战败对日本人的国家观造成了剧烈冲击，如何重构日本国民的文化身份认同，成为日本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自 1945 年日本战败至 2000 年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人类学者尾本惠市主持的文部省重大项目“关于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起源的跨学科研究”结束，在这长达 50 余年的时间里，日本学界带着重构日本国民文化身份认同的重大使命，围绕日本民族文化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以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为核心，会聚历史学、日本文学、语言学、民俗学、农

* 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日社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日本国民性。

学、生态学、遗传学、建筑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学者，以位于东京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和位于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为主要学术平台，以各种形式开展大规模跨学科比较研究，积累了相当厚重的研究成果。^①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室町时代文化研究，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兴盛起来的。著名日本文化史研究学者川嶋将生，1969年在《日本史研究》第102号上发表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关于中世声闻师的考察》^②，此后便专注于中世至近世的日本社会文化史研究，作为该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③，特别是其关于长期深受日本社会歧视的贱民阶层在日本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拟在梳理学界既有关于室町时代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川嶋将生关于室町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及其重要意义。

一 室町时代文化研究的现状

战后80年来，关于日本民族文化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一直受到各界学者的关注。有些学者虽然承认日本民族文化受到过外来文化影响，但坚持认为日本民族文化本自具足，并将其形成时间追溯到极为久远的神话传说时代，甚至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归因于日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更多的学者则主张室町时代的文化才是现代日本民族文化的原点，是“日本文化祖型”。^④较早提出也最具代表性的类似观点，是著名日本文化史学家内藤湖南的观点。他曾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爱抬高本国，这突出表现在抬高本国文化这一点上，认为本国文化是自发的。然而，除了极少数历史悠久的古国像埃及、中国、印度之外，

① 佐々木高明「戦後の日本民族文化起源論：その回顧と展望」、『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第34卷第2号、2009、211-228頁。

② 川嶋将生「中世声聞師の一考察」、『日本史研究』第102号、1969。

③ 羽田聡「書評 川嶋将生著『室町文化論考—文化史の中の公武—』」、『日本歴史』第739号、2009、110-112頁。

④ 飯島孝良「室町期における『禪文化』はどうみられてきたか—戦前から戦後における文化史観の変遷をたどって—」、『禪學研究』第101号、2023、75頁。

自发文化这种想法可以说是毫无理由的谬想。……对于日本文化的起源，也存在着同样的错误想法。以国史家为首，许多日本国民到今天还都肯定日本文化最初就存在，倾向于把它解释为选择、同化了外国文化而达到今天的发展的。这一错误思想由来已久，不妨说日本人一有国民自觉，同时就已被这种错误思想幽囚了。”^①“过去日本学者对日本文化的起源解释成为树木的种子本来就有，后来只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养分而成长起来的。我却认为比如做豆腐，豆浆中确实具有豆腐的素质，可是如果不加进使它凝聚的外力，就不能成为豆腐。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盐卤。”^②“日本文化是东洋文化、中国文化的延长，是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所以，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化。今天讲历史只讲日本的历史，而不了解以前中国的事情，那么，对于日本文化的由来就什么都知道了。”^③内藤湖南认为，作为中国文化延长线上的日本文化，在室町时代的应仁之乱（1467~1477）之后才真正形成了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时代。如果为了了解现在的日本而研究日本历史，那几乎没有必要研究日本古代历史，只了解应仁之乱以后的历史就足够了。应仁之乱以前的事，我们只会觉得和外国历史一样，而应仁之乱以后的历史才是与我们的身体骨肉息息相关的。真正了解这一部分历史，就可以说把日本历史学会了”。^④

笔者检索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文献检索网站截至2025年3月30日所收录的1945年以来关于室町时代的文献资料，总数量有20494份。其中，涉及室町时代的图书15000部，期刊论文4712篇，博士学位论文226篇。再具体细化到题目中含有“室町文化”的文献，其中图书179部，期刊论文99篇，博士学位论文3篇。^⑤比较而言，中国知网收

① [日]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储元熹、卞铁坚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4页。

② [日]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第7页。

③ [日]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第12~13页。

④ [日]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第168页。

⑤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文献检索网站（<https://ndlsearch.ndl.go.jp/>），最后检索日期2025年3月30日。

录的以“室町”为主题的论著及相关文献资料要少很多,总数量为598份,且大多只是在日本历史或者日本文化史论著中略有提及,不仅没有关于室町文化的专著,而且将属于室町时代文化范围内的文章全部加起来也不过数十篇而已,专论室町文化整体特色的文章仅有一篇。^①

笔者粗略比较了1945年以来中日两国学界关于室町时代文化研究的异同,发现其共性特点主要有两个。首先,大部分研究成果虽然各自表述略有不同,但大都认同内藤湖南的观点,即将室町文化看作现代日本文化的原点。例如,有的日文著作题目名称就直接使用“延续至现代的室町文化的形态”^②之类的表述,有的中文论文在阐述室町文化的意义时称:“研究和了解日本室町时代的文化对于研究现代日本文化的形成根源及其文化底流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很大的帮助。”^③其次,大部分研究成果侧重从文化形态视角来探讨室町时代的文化特色。

中日两国学界关于室町时代文化研究的不同点,主要也可归纳为两个。首先,虽然二者均注重对室町文化形态的研究,但日本学界更多的是探讨室町文化的日本民族文化特性,以致对所谓的日本文化特殊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受其影响的中国学界也产生了一大批探讨某种所谓“日本型”“日本式”文化的论著,甚至导致日本学者自身都怀疑日本文化是否真的很特殊。^④日本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青木保指出,重构日本人身份认同的战后日本文化论,对日本文化的评价也一直在摇摆。1945~1954年是对日本文化特殊性持否定态度的时期,随着日本社会经济高速发展,1964~1983年又转而出现在了对日本文化特殊性的充分肯定期。^⑤

① 中国知网最后检索日期2025年3月30日。

② 本間正樹『金閣・銀閣をしらべる:現代につながる室町文化のすがた』、小峰書店、1995。

③ 王军彦:《日本室町时代的文化及其特色》,《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57页。

④ 参见濱口惠俊編『日本文化は異質か』、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6。

⑤ 青木保『「日本文化論」の変容:戦後日本の文化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中央公論新社、1999、56-86頁。

与之相对，中国学界关于室町文化形态的探讨，则是在认可室町文化具有一定日本民族特色的前提下，更多地强调中国文化元素对其所谓独特性的形成造成了如何大的影响，或者纯粹从传播学角度来看，甚至可以称室町文化是中国文化在日本本土化的新形态。除了众所熟知的关于茶道、花道、香道、能、狂言、建筑、儒学、禅宗以及五山文学等的研究外，近年来还出现了关于中国医学对室町时代日本医学影响的研究。例如，有学者指出，明朝建立以后，由于当时日本国内战争频繁以及两国关系逐步正常化，中日之间的医学交流迎来了历史高峰。日本以遣明使的派遣为代表，通过赴明留学、医书输入及编撰、药材进口、名医物语等方式，为室町时代的汉方医学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中方则通过政府随团医者、在日唐医、遗民医者、俘虏医者等人物往来助推了日本汉方技术的发展。在日唐医的慷慨施诊、秘药的公开、中国药材与医书的自由出口、医术的无私传授等一项项实在有效的援助，不仅彰显了明廷对日本的友好态度，也为室町日本的医学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① 还有学者指出，日本室町时代民间流行的饮料“煎物”是以陈皮等物为主熬制成的保健药汤品，有祛痰止咳之功效。该学者通过考察和分析日本中世的历史文献，认为“煎物”之诞生与东传日本的中医医疗方密切相关。日本中世，宋金元医学知识随着禅僧传入日本，并对日本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② 这类研究成果从日本中世民俗角度考察中医知识的日本化，为中医文化东传日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次，日本学界自二战之前的研究就较为注重从文化形成论角度探讨室町时代的文化特色，较中国学界更加关注对室町文化的创造与传承主体的研究。学者因各自信奉的国家观不同，对室町时代及其文化的评价也不尽一致，甚至有些观点截然相反。例如，在信奉“皇国史观”的二战前，被现代日本学者视为“日本文化祖型”的室町时代曾经被

① 陈小法、黄璨：《明代中日医学交流研究》，载吴怀中主编《日本文论》2024年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第77页。

② 王育洁：《日本中世饮品“煎物”与中医知识日本化的关联性研究》，《湖南中医杂志》2025年第1期，第68页。

评价为“文化的黑暗时代”。^①日本国史学者黑板胜美(1874~1946)更是将室町时代贬低得一文不值,称:“日本历史上最可悲的时代就是室町时代,这是一个于内忘记皇室的尊贵,对外危害帝国之独立的时代,是一个完全失去了作为日本国民之自觉的时代。导致如此惨状的代表性人物就是足利将军,以及聚集于其下的幕府诸武将。无论是所谓大放异彩的五山文学,还是所谓绚烂多姿的东山艺术,不过是粪土上丛生之物而已。一切都是利益主义、个人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时代说的就是室町时代。”^②与之相对,战后一段时间一些曾摆脱了“皇国史观”桎梏的日本文化研究学者,对于“下克上”的室町时代则是褒奖有加,对于作为室町文化创造主体的农工商庶民群体以及穷苦农民出身的一些下级武士予以高度关注^③,但对于那些不在士农工商之列的“河原者”“散所者”“秽多”亦即深受日本社会歧视的贱民阶层,在室町文化的创造和传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关注不足。因此,川嶋将生《室町文化论考:文化史中的公武》等相关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了长期受日本社会歧视的贱民阶层在室町文化创造与传承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恰恰弥补了学界这一研究的不足,对我们探讨当代日本社会人权问题的历史渊源等尤具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正是本文介绍川嶋将生室町文化研究相关成果的原因。

二 川嶋将生对“室町文化”概念的界定

如前文所述,信奉“皇国史观”的一些学者对室町时代及其文化持强烈否定态度,甚至认为室町时代是“文化的黑暗时代”。这主要是

-
- ① 赤田達郎「中世史研究解説 四 文化」、『岩波講座 日本歴史 8 中世4』、岩波書店、1963、310頁。
 - ② 黑板勝美「室町時代の文化的概観」、黑板勝美『虚心文集 第四』、吉川弘文館、1939、37頁。
 - ③ 参見林屋辰三郎『中世文化の基調』、東京大学出版会、1953;永島福太郎『中世の民衆と文化』、創元社、1956;熱田公「民衆文化の台頭」、『岩波講座 日本歴史 8 中世4』、岩波書店、1963、239-270頁。

因为，幕府将军足利义教（1394~1441年）在其执政时期，无论是对公家、武家的反对者，还是针对寺院暴乱僧众的武力镇压，皆杀伐果断毫不手软，甚至扬言要打造“万人恐怖之世”，其残暴血腥的言行给当时乃至后世的日本人心里留下了重重的阴影。^①因此，迄今为止，即使是意将室町时代视为“日本文化祖型”的学者，一提到室町时代的文化史，也总是喜欢使用以幕府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年）时期为中心的“北山文化”及以足利义政（1436~1490年）时期为中心的“东山文化”这两个概念，对室町文化泛泛而论，完全无视介乎足利义满与足利义政之间的足利义教时期的文化价值。

中国学界对室町文化的表述基本上沿用日本学界的这些学术概念。与一些叙述简略的日本历史类著作相比，著名日本文化研究学者叶渭渠的《日本文化通史》的记述较为全面扼要。叶渭渠称：

室町时代初期，统治者足利义满、义持时代，在北山营造山庄，于应永五年（1398）建筑金阁（舍利殿），一层是贵族寝殿式风格，二层是武家式风格，三层是佛教式风格，既有公家传统的寝殿式古典建筑艺术元素，又含有武家已流行的禅宗建筑艺术的要素，从中展示了武家的精神生活，以此象征其拥有黄金财富和专制权力的威严，同时还有宗教的背景，象征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这种华丽的造型，使现世的快乐与极乐往生浑然一体，反映了公家和武家政治文化的融合性，代表绚烂华丽的文化。这一时期，将军周围还结集了许多禅僧、画僧、学者、艺能家，创造了新的文化，称为“北山文化”。到了室町时代中期，随着武士经济生活的改善，文化生活的提高，将军足利义政将山庄移至东山后，于文明十五年（1483）建造了银阁，下层是住宅式，上层是佛殿式，简素淡雅，初露了“空寂”（わび）和“闲寂”（さび）的审美情趣，给人一种寂静谛观的印象，这里也有禅文化的背景，代表闲寂枯淡的文

① 川嶋将生『中世京都文化の周縁』、思文閣出版、1992、213頁。

化。以此为象征的文化,称为“东山文化”,对这一时代的文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日本文化史上,“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被统称为室町时代的文化。^①

大概是囿于通史性作品的特殊性质,在《日本文化通史》这部目前中国学界最具权威性的日本文化研究著作中,也只是对日本学界部分相关研究成果做了提炼总结,尚未能顾及足利义教时期的文化价值。

其实,日本历史学家永岛福太郎等早就曾指出过足利义教在室町文化发展史上发挥的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②,只是未做深入讨论。1992年,川嶋将生在其研究室町文化的第一部专著《中世京都文化的周缘》中特设一节专论“足利义教与其文艺”,首次从文化形态与文化形成论两方面深入探讨足利义教时期在室町文化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川嶋将生研究指出,“北山文化”与“东山文化”并非两种迥然不同的存在,从官僚制度到以文艺为首的幕府举办的各种节日庆典文化活动,乃至其收集的来自中国大陆等地的绘画、陶瓷器皿等“唐物”,大多是足利义教严遵“先例”即对足利义满时期文化原封不动的继承,并且这些又被足利义政原封不动地继承,成为学者口中的“东山文化”的核心内容。因此,“北山文化”与“东山文化”不仅在文化形态上一脉相承甚至是原物相继,而且文化创造与传承主体特别是艺能文化的创造与传承主体基本一致,即以贱民为主。^③

为了进一步探讨人们是何时何故开始关注并赋予被称为“东山时代”的足利义政时代在日本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在日本历史研究中“东山文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又是从何时开始使用的,2007年川嶋将生专门对“东山文化”这一学术概念的诞生过程做了全面翔实的考证。据川嶋将生的考证,日本文化界对足利义政时代的关注从16

① 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17页。

② 永岛福太郎「茶事の成立—足利将軍家の茶湯—」「東山文化」、永島福太郎『茶道文化論集 上巻』、淡交社、1982、76-87頁。

③ 川嶋将生『中世京都文化の周縁』、213-238頁。

世纪就开始了。不仅是日本茶道，而且香道、绘画等很多日本传统文化的成立时间都被追溯到足利义政时期，但这种追溯与历史事实是不相符的。将足利义政的隐居生活与以茶道、花道、香道为首的日本生活文化相互关联的叙事，是对足利义政时期文化的过高评价，事实上那些文化形态都是在足利义政之后的天文时期（1532~1555）才真正成形。^①

具体到“东山文化”“北山文化”作为历史研究术语出现的时间，首先，从日本史辞典的内容来看，吉川弘文馆明治41年（1908）初版、大正4年（1915）增订版《国史大辞典》中不仅没有“东山文化”“北山文化”的词条，而且连“室町文化”的词条都没有。一般而言，在权威辞典中收录的词条大多依据那个时代的研究水平等反复遴选。由此看来，明治末年室町时代的文化尚未引起日本史学界的关注。在至今学界评价都非常高的富山房1940~1943年陆续出版的《国史辞典》中，也没有“东山文化”“北山文化”词条。河出书房新社自1960年开始出版的《日本历史大辞典》中，才出现了“东山时代”词条，该词条简要述及了一些文化问题，但仍然未见“东山文化”词条。到了角川书店1966年出版的《角川日本史辞典》，才首次出现了“东山文化”“北山文化”词条。

其次，从学术著作或论文中“东山文化”用语的使用情况来看，森末义彰1942年出版的《东山时代与其文化》的“东山文化的基调”中称：“东山文化可谓立于公家文化之基础上的武家文化，进而发展为公武文化浑然融合的文化。”^②这也是日本史研究中首次使用“东山文化”这个用语。在著作名称中首次使用“东山文化”的是河出书房1945年出版的芳贺幸四郎著《东山文化的研究》。从论文来看，芳贺幸四郎1941年就曾使用“东山文化”一词撰写过论文。因此，芳贺幸四郎可以说是最早将“东山文化”作为日本文化研究用语使用的学者之一。其后，永岛福太郎在创元社1956年出版的专著《中世的民众与文

① 川嶋将生「『東山文化』の誕生：その言説の成立」、『アート・リサーチ』第7号、2007、89-95頁。

② 森末義彰『東山時代とその文化』、秋津書房、1942、99-130頁。

化》中叙述“室町文化”时专门提到“东山文化”“北山文化”，1963年版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中收录了林屋辰三郎专论“东山文化”的文章。

总体来看，战后日本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前后才开始逐渐使用“东山文化”这个术语。这恰好与日本学界探讨日本民族文化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逐渐走向高潮期相吻合，也与日本文化特殊论再度大行其道的时期相一致。对于经历过战败而复归生活稳定、经济繁荣的日本而言，向室町时代寻求现代日本文化“祖型”时，不愿意提及专断残暴杀伐血腥的足利义教时代，而是寄托于社会发展相对稳定的足利义政时期所谓的“东山文化”，其心境也是不难理解的。倡导“和敬清寂”精神的日本茶道一度被理解为“东山文化”的核心内容。如果不顾历史事实，割裂“北山文化”与“东山文化”，无视足利义教时期的文化，忽略足利义政之后的文化，这种无视其相互关联的做法，显然不利于真正把握室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更无助于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质。因此，为了精准把握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状况，川嶋将生主张，作为一个学术用语，使用时代名称“室町”来命名这一时期的文化，即用“室町文化”这一概念取代“东山文化”“北山文化”等用语较为合理，也更符合历史事实。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和考量，川嶋将生将其第三部专著命名为《室町文化论考：文化史中的公武》。^①

需要注意的是，从《室町文化论考：文化史中的公武》的内容构成来看，川嶋将生倡导的“室町文化”概念涵盖的内容并不仅限于日本历史习惯的“室町时代”（1336~1573年）分期，“室町文化”内容的时间下限跨越室町时代延展到近世初期即17世纪。川嶋将生如此界定“室町文化”时间下限的一个重要依据便是文化创造传承主体的一致性及其与公家、武家的关系变化。室町文化本是民众为了自娱自乐自发的自由创造活动，文化的传播也是由下而上，是一种庶民文化反哺公

^① 川嶋将生「室町文化論考：文化史のなかの公武」、法政大学出版社、2008、「序」、3頁。

武文化的文化形态。另外，从文化创造方式来看，室町文化既不同于既往那种一个个文化人闷在书斋中苦思冥想而成，亦非既往那种通过观照花鸟风月类狭隘的自然而成，而是有组织的民众作为文化的创造者，作为一个集团大范围直接参与文化创造。这种文化创造模式，也是“下克上”的室町时代民众才能拥有的文化创造方式，也正因此才赋予了日本文化新的可能性。换言之，日本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正是因室町时代民众这种充满活力的文化创造力才形成的。

以日本元和年间（1615~1624）为界，室町文化的创造与传承主体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宽永时期（1624~1644）以后，日本的各种艺能迎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传统艺能的地位也逐渐确立，虽然文化的创造与传承主体依旧以贱民阶层为主，但从其与公家、武家的关系来看，其创造与传承活动中显然多了一些统治者意志的影响，少了一些往日的自由自在。例如，元和年间在幕府的介入下，艺能演出场所被迫由京都五条河原迁址四条河原，幕府对以游女歌舞伎等为首的各类风俗管控越来越严格，等等。川嶋将生依据文化创造传承主体及其与公家、武家的关系变化，主张至少从元和时期至宽永初期的文化都是室町文化的延长，但其后文化的性质就发生变化了。也就是说，“室町文化”涵盖的时间下限可划到17世纪中后期。^①

三 川嶋将生室町文化论的内容特色

川嶋将生自1969年在《日本史研究》第102号上发表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关于中世声闻师的考察》，一直专注于研究中世至近世长期深受日本社会歧视的贱民阶层在室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等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川嶋将生室町文化论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其三部专著中，依次为思文阁1992年出版的《中世京都文化的周缘》、思文阁1999年出版的《“洛中洛外”的社会史》、法政大学出

^① 川嶋将生「室町文化論考：文化史のなかの公武」、「序」、5-7頁。

版局2008年出版的《室町文化论考：文化史中的公武》。总体而言，这三部著作从文化形态论与文化形成论两个视角，较为全面立体深入地解析了中世“非人”即贱民阶层在室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研读这三部著作，发现川嶋将生室町文化论的内容特色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川嶋将生较为注重从中世贱民的生活场域着手，探讨其生存状态与创造的文化形态。这既是川嶋将生室町文化论的重要内容特色，也是从事该问题研究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日本社会长期称呼中世贱民为“非人”，为了阐述清楚其创造的文化形态，首先对人们陌生的贱民生活场域有个整体的把握是非常必要的。长期受到日本社会歧视的贱民大多居住于城市周边的河边等处，因此贱民虽然被统称为“非人”，但往往又会因其居所而被称为“河原者”“散所者”等。川嶋将生的第一部专著《中世京都文化的周缘》，就是其恩师林屋辰三郎考虑到川嶋将生的研究对象——中世“非人”分散居住在京都周边，才起了这样一个书名。第二部专著《“洛中洛外”的社会史》的“洛中洛外”就是京都城市内外的意思。第三部专著《室町文化论考：文化史中的公武》中的“室町”，虽然川嶋将生是出于时代名称考虑予以命名的，但实质上这也是一个表示场域的名称。

其次，川嶋将生的室町文化论较为注重叙事的层次感，注意研究视角由文化形态论逐渐向文化形成论的调整。第一部专著《中世京都文化的周缘》主要由序言、正文四章与附论六部分组成，仅从第一章“中世京都的发展”、第二章“都市的周边”、第三章“室町文化的动向”、第四章“宽永文化的诸相”、“附论：围绕重启朱印船贸易的一史料”的标题亦大体可知，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探讨贱民自身的生存状态及其创造与传承的文化形态。

作为《中世京都文化的周缘》姊妹篇的第二部专著《“洛中洛外”的社会史》篇幅大幅增加，主要由“序章：鸭川的历史景观”，“第一部：京洛与町人”（包含第一章“福神与招福”、第二章“京都町人的游乐与茶”、第三章“京都导游记的成立”、第四章“会所的聚会与町

的运营”、第五章“寺院与开账”），“第二部：中世被歧视民的状态”（包含第一章“中世后期的被歧视民与权门”、第二章“山科家的散所与河原者”、第三章“园艺师的系谱”、第四章“中世被歧视民的‘业’的传承”，“第三部：中世后期的京郊村落”（包含第一章“山城国爱宕郡久多庄”、第二章“惣之印”、第三章“宇治的番保”、第四章“惣村的信仰与艺能”、第五章“南山城与织丰政权”），以及“附篇：落书的系谱”构成。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开始探讨居住于京都周边即“洛外”的贱民在与那些居住于都城中即“洛中”的町人以及寺院权贵交往过程中，如何不断丰富和完善艺能内容等问题。

第三部专著《室町文化论考：文化史中的公武》由“序章”，“第一部：公家与武家”（包含第一章“室町期武家掌故的成立”、第二章“丹波猿乐的盛衰”、第三章“室町时代的信仰与艺能”、第四章“古笔需求的社会背景”、第五章“战国期的公家与将军——以松殿忠显为例”、第六章“大觉寺义俊的活动”、第七章“藤谷为贤小论——宽永文化期的一公家的活动”、第八章“四条河原的历史环境”、第九章“江户时代前期的朝仪复活——关于后七日御修法的再兴”），“第二部：秽与公武”（包含第十章“散所研究与近江”、第十一章“绘图和古地图中描绘的中世被歧视民”、第十二章“过渡期的河原者动向——从十六世纪后半至十七世纪前半”、第十三章“中世被歧视民研究现状与课题——与诸领域的关联”），“第三部：史料的翻刻”（传明惠上人笔“护身法事”纸背文书上的乐书、《南柯记》）构成。恰如该著作的副标题“文化史中的公武”所示，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探讨的是中世贱民在与公家、武家的互动中如何对公武文化予以反哺的情况。至此，川嶋将生集数十年之功，通过三部著作，较为系统全面立体地呈现了中世“非人”即贱民在日本社会中存在的状态，以及中世贱民与日本社会各阶层的互动状态，层层递进，深入解析了中世贱民在日本民族文化创造与传承上发挥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作用。特别是在该著作第十三章，川嶋将生不仅细致梳理了日本学界的贱民研究现状与课题，而且认真探讨了今后如何更有效地开展跨学科研究。

最后，川嶋将生虽然翔实地考察了中世贱民在日本民族文化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但他并不认为这些文化都是中世贱民个人独创，而是将其视为在“下克上”的室町时代源自中国的文化流落地方后本土化发展的结果，而且川嶋将生还格外注重其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川嶋将生在新近发表的论文《东亚视域下日本艺能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再次指出：

传统艺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研究日本文化，不能忽略对日本传统艺能文化的研究。日本传统艺能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是受歧视的贱民。既有研究，无论是民俗学研究，还是艺能史研究，其主旨还是在于通过对艺能形态的解析来探讨日本文化的特质，而对艺能传承者贱民本身却关注不足。特别是对贱民在日本社会体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或者说日本社会要求他们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贱民在日本社会体系中的定位等问题，尚未开展充分的研究。恰如诸多先行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贱民拥有的技术和技能、职能是日本社会不可或缺的，贱民本身成为日本社会秩序的重要构成要件，在日本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贱民究竟发挥着怎样的社会功能，又是如何来维护其自身的地位与社会角色的？……日本的被歧视民众与盘古神话间的关系也在提示我们，日本艺能文化的国际比较研究不应仅停留于艺能形态的比较层面，亦应该进一步加强东亚视域下日本艺能的思想背景研究。^①

结 语

如上所述，本文在梳理战后 80 年来日本民族文化起源论热议背景

①〔日〕川嶋将生：《东亚视域下日本艺能文化的比较研究》，张建立译，载吴怀中主编《日本文论》2024 年第 1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第 10~11 页。

下兴起的“室町文化”研究现状基础上，扼要探讨了川嶋将生关于室町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及其重要意义。一般认为，文化大多是自上而下传播的。然而，川嶋将生的室町文化论考为我们展示了在“下克上”的室町时代，社会底层的“非人”即贱民创造传承的文化对公家、武家乃至寺家权贵文化的反哺情景。略微了解一些日本文化者大概都听过“公家文化”“武家文化”“寺家文化”“町人文化”等词语，都是从文化形成论视角，从文化创造主体层面来阐述日本文化的某一形态，也是日本研究者经常用到的专业术语。遗憾的是，恐怕大家很难听到“散所者文化”“河原者文化”“秽多文化”或者以统称“散所者”“河原者”“秽多”的词语“非人”“部落民”“贱民”命名的“非人文化”“部落民文化”“贱民文化”。仅仅从川嶋将生的室町文化论考来看，从室町时代社会底层的“非人”即贱民创造与传承的文化对公武乃至寺家权贵文化的反哺情况来看，无论是《中世京都文化的周缘》、《“洛中洛外”的社会史》，还是《室町文化论考：文化史中的公武》，都可谓探讨“非人文化”“部落民文化”“贱民文化”的精品力作，但终究未见其中哪个词语能够成为描述室町文化的学术用语。或许纵使有学者敢于使用这些术语，在日本学界也难以获得学术话语权吧。这也是研读川嶋将生室町文化论考后感到的一点遗憾。

（审校：陈 祥）



context of philology and conceptual history, the conception in a broad sense mostly involves Confucianism, which means learning common to ancient East Asia. During early modern times, a process of Japanization occurred,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exclusive ideological endeavors of Motoori Norinaga, result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st Asian studies” into “imperial studies”. Furthermo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logy, the traditional expansive domain of knowledge underwent a metamorphosis into a more specialized and subdivided discipline within the modern academic framework. After the World War II, amidst shifts i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andscapes and a deeper contemplation of modernity, the discourse surrounding New Kokugaku intertwined with folklore began to surface. This led to a resurgence i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Kokugaku, bringing it back into the broader cultural domain of East Asia.

Keywords: East Asian; Kokugaku; Academic Discourse; Motoori Norinaga

• Thought Research •

A Study on Muromachi Culture by Kawashima Masao

Zhang Jianli / 173

Abstract: Over the past 80 years since World War II, the origins and formation of Japanese national culture have been a subject of interest among scholars. Some researchers trace the formation of Japanese culture back to ancient mythology, arguing that it is an intrinsic entity that has continuously absorbed foreign cultural elements for growth. However, a greater number of scholars assert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Muromachi period serves as the true

origin of modern Japanese national culture. While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imarily exa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romachi culture from a cultural morphological perspective, Kawashima Masao's "A Study on Muromachi Culture" and related works take a different approach. They focus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formation and emphasize the role of marginalized groups, particularly the burakumin class, in the cre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Muromachi culture. This perspective provides valuable historical insights into contemporary human rights issues in Japanese society.

Keywords: Kawashima Masao; Ethnogenesis of Japanese Culture; Muromachi Culture; Burakumin; Human Rights

Research of the Japanese “Realist Intellectual” Nagai Yonosuke’s Political Thought

Guo Hongyi / 188

Abstract: Post-war Japanese political science intellectuals mostly influenced b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which was known as Japanese “Realist Intellectuals”, include Kosaka Masataka, Kamiya Fuji, and Nagai Yonosuke, ha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post-war Japanese political science. Before the 1960s, Nagai Yonosuke focused on the research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ical theories, as well as analyzing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social issue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 then applied these theories to analyze Japanese society, thereby developing cutting-edge realist political science ideas. In the 1960s, Nagai’s academic research shifted from political sociology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th his focus moving from domestic politics to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rena. This shift in research subjects reflected the process of “power theory” spanning both fields of political science. As he became a realist intellectual, Nagai with intellectual